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新加坡］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一、导言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我们正经历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但新的秩序尚未生成。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上一个颇具“可塑性”的时刻。因此，认真思考如何重塑世界秩序可谓正逢其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我们正经历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但新的秩序尚未生成。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上一个颇具“可塑性”的时刻。因此，认真思考如何重塑世界秩序可谓正逢其时。

为了认真思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先要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性质。首先，我们正见证着世界历史由西方掌控的时代的终结（但我要紧接着说，世界历史由西方掌控的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终结，它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文明）。其次，我们正在见证亚洲的回归。我之所以称之为回归而非亚洲的崛起，因为自公元元年至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只是在最近这两百年中，先是由欧洲，继而由北美领先。在过去2000年，这两百年就是一次大的历史偏轨。任何历史偏轨都会自然而然地终结。因此，当高盛集团预测到2050年或是更早，中国和印度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

简而言之，我们将经历数百年不遇的权力转移。过去，紧张和冲突总是与这种权力转移相伴随。为了加强全球治理，我们将不得不促进互信并增强进行全球合作的动力。但是当前的地缘政治只会深化互不信任，并且导致对合作的抗拒。

［新加坡］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最明智的倡导者之一。他曾经说："二战后为一个充满破败经济体和仅有50个国家的世界所建立的国际机制尚未破产，但是对于一个拥有200个国家的世界和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来说，这套机制迫切需要更新和改革。"然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婉地请英国与他国"共享"其在该组织执行董事会的那个席位时，布朗随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全球外交行动予以阻挠。说到底，甚至对于像布朗这样拥有全球性思想的领导人，全球利益也不会赢过（在已成往昔的大英帝国时代所获得的）国家特权。当我们看到，明智如布朗者都不能够为了更大的全球公益而忍受小小妥协，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妥协是多么困难便可想而知了。

更加困难的是，当中国在2027年或更早时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这将是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来，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占据第一。上一次第一位次的转换发生在19世纪晚期，那时是美国超过了英国。因为让位于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伙伴国家并不会产生什么文化上的不适感，所以相对来说，英国让位于美国时并没有什么抗拒。当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时，要想让美国也像英国那样舒适地将世界第一的位次让于中国，就需要极大的智慧。

在华盛顿，智慧正在变为一种稀缺品。二战后，当美国实力无可比拟并君临天下之时，它扮演了一种异常温和的全球霸权角色，以倡导和施行二战后确立的那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无疑，这种秩序是美国和欧洲给予世界的礼物，并且（部分地）解释了为何我们至今仍未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确保全球秩序，美国做出了大量的妥协。要想做出这样的妥协，需要巨大的自信和慷慨精神。

二战后，当美国实力无可比拟并君临天下之时，它扮演了一种异常温和的全球霸权角色，以倡导和施行二战后确立的那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如今的美国不再具有50年前其权力鼎盛之时所具有的那种自信和慷慨精神。

显然，如今的美国不再具有50年前其权力鼎盛之时所具有的那种自信和慷慨精神。欧盟也是如此。然而，即便美欧在全球事务上的不安全感在增长，我们仍可以期待两者做出重大妥协，以重塑世界秩序。它们之所以要做出重大妥协，是因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几乎所有多边机制和进程都是为维护西方掌控世界历史这一利益而设计的，但它们并不合乎新时代的利益。因此，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重塑这些机制和进程，以使它们反映出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

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我们的全球机制已经变得多么过时。联合国安理会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安全机构，但本质上这个机构是由五大常任理事国所掌控的。它们被选为常任理事国的主要标准就是，这些国家在1945年是二战的战胜国。的确，它们是那个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了2045年，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将仍然是强国。在哪一个历史节点，那些1945年的强国将在联合国安

理会让位于那些2045年的强国呢？英国和法国何时才会放弃它们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代之以一个欧洲席位，从而体现欧洲新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与联合国安理会相类似，另一条“1945年规则”还在困扰着世界上最有力的两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作为美欧两强之间政治大交易的结果，世界银行行长和IMF总裁分别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担任。这条规则自1945年以来一直被实施，从未中断。但是，如果这条规则在21世纪仍将被实施，那就意味着40亿亚洲人永远也不具有领导IMF和世界银行的资格，即便亚洲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最大的外汇储备和最多的经济学博士。显然，这是十分荒谬的。

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版图中发现荒谬之处。但是，要想消除或改革这些荒谬之处又会是相当困难。

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版图中发现荒谬之处。但是，要想消除或改革这些荒谬之处又会是相当困难的。

二、亚洲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如果亚洲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全球治理改革也是无法避免的。西方很多人担心，为了与亚洲崛起相适应，全球治理的所有机制和进程都将不得不被彻底革新。但是，亚洲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不会是这般简单。实际上，亚洲的影响是有矛盾性的。

亚洲崛起意味着亚洲国家将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结伴而行，成为全球秩序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亚洲国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它们是1945年以来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那种革命性的变革并非亚洲国家所追求的。

一方面，亚洲崛起意味着亚洲国家将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结伴而行，成为全球秩序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亚洲国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它们是1945年以来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那种革命性的变革并非亚洲国家所追求的，当前全球治理现状（the status quo）在很多方面都使亚洲国家获益良多，它们并不想放弃这些好处。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证明亚洲国家想要保持现状的最好例子。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7年创立及1995年演变为WTO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全球贸易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全球贸易中的最大增长出现在亚洲。比如，在过去25年，单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速度之快足以使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由3.4%提升至10.5%。

IMF则提供了另一个可以证明亚洲愿意维持全球治理现状的例证。在很多方面，1997—1998年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很多亚洲国家不再信任IMF，因为

后者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很糟糕。亚洲国家普遍认为，IMF 对这场危机的处理非常拙劣。亚洲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愿从 IMF 借款，这反映了它们对 IMF 缺乏信心。那些可以向 IMF 偿还所有欠款的国家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少亚洲国家通过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也是历史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来确保它们相对于 IMF 的独立性。

2007—2008年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亚洲国家已极大地丧失了对 IMF 的信任，但在支持增强 IMF 作用上它们并未犹豫。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决定把对 IMF 的注资增加三倍，增至7500亿美元。亚洲国家也同意作出更大贡献，特别是中国同意向 IMF 注资500多亿美元。

WTO 和 IMF 的例子表明，亚洲人并不想要把现行的全球秩序拆毁。反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亚洲人将继续运用这些机制，即便这些机制并不完美。但是，在这些国际机制的管理和控制方面，亚洲国家显然期待看到一些彻底的变革。比如，在 IMF 和世界银行，现行的投票权的安排让西方国家占据了掌控地位，尽管在这些组织于1945年创立之后亚洲在全球 GNP 中所占的份额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正如前文所言，由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出任 IMF 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已成为一条不成文却难以更改的规则。结果，即便亚洲人占世界总人口60%并在经济、管理和思想领域展现了非凡才能，但还没有亚洲人担任过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显然，这是一个时代错误。常识告诉我们，这条规则应被废除。

简而言之，亚洲在对待全球治理改革方面的矛盾性在于，亚洲人既想看到变革，又想保持其延续性。他们做好了接受现行多边机制和进程的思想准备，但也希望这些机制和进程得以改革并适应亚洲的崛起。理论上，这种实用主义的亚洲方式应该能使全球治理的改革更加容易。但是，在实践中，西方不愿进行认真的调整以适应亚洲崛起，因此全球治理很难实现重大的改革。证明这一观点的最好办法，就是援引迄今为止仍未取得成功的两大全球性协商作为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第二个例子就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亚洲做好了接受现行多边机制和进程的思想准备，但也希望这些机制和进程得以改革并适应亚洲的崛起。但是，在实践中，西方不愿进行认真的调整以适应亚洲崛起，因此全球治理很难实现重大的改革。

本文篇幅有限，很难针对这些协商中的孰是孰非给出细致的分析。但是在贸易领域，很显然，欧洲和美国保护主义情绪的增长可以解释，为何世界在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将面临多哈回合谈判可能破局这一真正危险。包括 WTO 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在内的很多知名人士都已表示，形势非常严重。之前所有回合的贸易谈判之所以会取得成功，那是因为美国和欧洲这两大全球开放贸易体系的监管者，都认为国际贸易体系的持续开放符合其利益。如今，这两大监管者对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正日益表现出谨慎态度，因为美欧的民众担心贸易自由化仅仅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将抢走他们的就

业岗位。直面国际竞争是需要自信心的。自信心的减弱会导致开放程度的降低。让形势变得更加困难的是，欧盟和美国都拒绝遵守之前曾做出的关于结束农业补贴的承诺。每年平均下来，欧盟和美国的农业补贴分别达到67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1995年至200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所给予的农业补贴总额超过1600亿美元。虽然从经济学角度很难证明这些补贴的正当性，虽然这些补贴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没有哪位美国和欧洲的政界人士能够承担得起失去农业利益集团支持的损失。

当大多数人思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新的排放，也就是“增量”的问题。但是我们所忧心的温室效应并不是由当代的排放造成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长年累积的，尤其是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这两百年间的排放，也就是“存量”问题。

相类似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难以找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原则，可以指导各国如何分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简单讲，这里面有一个“存量”和“增量”的问题。当大多数人思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新的排放，也就是“增量”的问题。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是我们所忧心的温室效应并不是由当代的排放造成的，即便当代的排放使问题更严重了。根本原因是我们长年累积的，尤其是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这两百年间的排放，也就是“存量”问题。因此，要想公正、合理地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必须根据“存量”和“增量”分配责任。戴厄（Gwynne Dyer）曾非常到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这两百年里，现在已经‘发达’的那些国家靠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s）富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排放的温室气体充满了大气层，以至于如今要想避免造成灾难性的气温上升，就几乎没有吸收二氧化碳的剩余空间了。这意味着，如果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沿用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模式，就会让整个世界面临无法控制的气候变暖。然而，因为这些国家仍然相对贫穷，他们一直大量地使用化石燃料，就像西方在开始工业化的那个阶段所做的一样。很多替代能源现在确实已经出现了，但是价格较高。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历史发展情况呢？发达国家必须大力、迅速地减少它们的排放，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以补贴这些经济体弃用化石燃料、改用清洁能源所带来的额外支出”。

当我们探讨如何解决在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中产生的任何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期待国际社会较富有的成员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有关公正的自然准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推进全球性减排，显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责任。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确实在增加，但是它们的人均排放量无论如何也没有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理由让西方较富的工业化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因为它们要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存量”负首要

责任。185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到8%，而美国和西欧则分别占29%和27%。从人均排放量来说，印度仅是美国的4%、欧盟的12%。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较富的西方国家明确地承认自己的责任，但至今它们仍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亚洲国家都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在减排方面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然而，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美国不愿采取任何重大的减排措施致使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失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Jairam Ramesh）在其近期发表在《经济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一看法，“富国不愿因大幅减排而承受财政和生活方式上所需付出的代价，发展中国家则称为了发展经济，它们必须被允许增加排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拉梅什认为，诸如美国这样的富国正在进行的减排“如贫血般乏力”。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通过转让减排技术，资助脆弱社群以降低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帮助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

世界在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和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很好地说明了，世界秩序如果不去因应亚洲崛起而做出调整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努力必须要从一个前提条件出发，即为应对亚洲的崛起，世界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然而，西方的决策者们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一前提的准备。

三、全球性调整

正如前文所言，亚洲人在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的目标是带有矛盾性的：他们既想看到改变，又希望保持连续性。与之类似，亚洲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式问题上也存在矛盾性：他们既具有高度原则性，又是实用主义的。

有一些根本性原则是亚洲人所坚守的。第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正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公正的代表权原则。在21世纪，所有全球性组织要想保持它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它们的构成就必须反映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政治和经济的新现实，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在很多重要的全球性组织中，欧洲的代表权无疑是过大了。2009年9月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欧洲是一个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相对于它的经济和人口的分量，它在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际论坛和组织）中持续占据着过多席位。实际上，欧洲人无法继续保持它们过大的代表权，过大的代表权在弱化全球性组织的同时也使欧洲人的声音变得分散并削弱了欧洲的影响力；欧洲人也无法将它们的投票权、席位和声音进行捆绑以获得更大影响力并促使国际

亚洲人在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的目标是带有矛盾性的：他们既想看到改变，又希望保持连续性。与之类似，亚洲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式问题上也存在矛盾性：他们既具有高度原则性，又是实用主义的。

在21世纪，所有全球性组织要想保持它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它们的构成就必须反映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政治和经济的新现实。

组织更加有效。不幸的是，目前欧盟在内部治理问题上所遇到的僵局使得欧洲难以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找出什么新路子。

有两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欧洲人代表权过大的问题。第一个例子是IMF的投票权。虽然欧盟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2%，GDP占全球GDP的17%，但是这些国家在IMF却握有32.08%的投票权。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拥有4.57%的投票权，比中国3.66%的投票权还要多，即便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代表权问题上，IMF已经采取了某些尝试性的改革措施。2010年，IMF将大约6%的投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新达成的份额公式取各国GDP、开放度、经济波动性和国际储备额的加权平均值），欧盟国家的投票权将由32.08%降至31%。IMF已经同意将发展中国家的总投票权由31.17%增至34.49%，其中主要是将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从23.88%增至25.64%。对于IMF这个一直固执地抗拒变革的组织来说，这只是微小的一步。获得公正合理的代表权仍需时日，但亚洲人是有耐心的。

即便是在非经济领域，欧洲人仍然是对变革的最大抗拒者。让我们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为例。虽然这个组织的名称是经社理事会，但它的关注点主要是在社会挑战方面。在这个组织中，西欧国家共拥有13个席位，占全部54个席位的24%，但欧洲总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0%左右。与之相反，亚洲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0%，但亚洲国家只拥有经社理事会20%的席位。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虽然所有人都很清楚欧洲在大多数全球组织中握有过大的代表权，但欧盟国家政府却不愿放弃这种握有过大代表权的习惯。比较近的一个例证就是2008年成立的新的人权理事会（HRC）。最初，欧盟坚决要求它在人权理事会所占席位的比例应与其在经社理事会中所占席位比例一致。亚洲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并坚持认为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分配应反映出各地区的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席位比例。当欧盟拒绝这一建议后，亚洲国家又要求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分配应与全球人口的分布情况相一致（欧盟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2%，亚洲占60%）。面对这样一个带有威胁性的提议，欧盟做出了让步，同意了亚洲国家的上一个建议。“公平的地域代表性”（equitable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理念似乎已在联合国获得吸引力并扎下根来。人权委员会创立以来，这一原则也被运用到近年成立的联合国妇女署（整合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涉及妇女事务的机构）执行局的席位分配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推动下，联合国妇女署执行局同意在成员国选举问题上采取“公平的地域代表性”原则。这是西欧等国和欧盟为了推进联合国妇女事务所做的又一次让步。

实现全球治理改革的第二个关键原则是“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ility）。亚洲国家坚持认为，不应有双重标准。任何原则都应平等地运用于所有国家。让我们看看近年的一个例子，这是说明这一原则的最好方式。长年以来，美国都试图让各类人权机构通过谴责若干国家人权记录的决议。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

因为它总体上拥有尊重人权原则的良好表现。但是，当美国在关塔那摩基地对囚犯实施酷刑后，它便失去了所有的道德权威性。欧盟亦是如此，因此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愿意在人权委员会对美国做出正式谴责。

简言之，在联合国，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教训亚洲国家的时代正在结束。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不得不承认，在不同程度上它们都是不完美的，它们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关键性原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应促进一种新型对话，这种新型对话建立在“国际法面前，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之上。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停止使其自身成为各种国际法条约和公约的例外，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全球治理改革的第三个重要原则是促进国际秩序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因为亚洲国家现在是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它们希望看到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的强化而不是弱化。亚洲国家乐于接受一个越来越多的条约和公约被协商并被所有国家所接受的世界。比如，之所以中国乐于加入 WTO，是因为它乐于加入一个可以解决贸易争端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显然这是与武断、多变的美国国会打交道的更好方式，美国国会动辄对别国强加贸易措施，且不承认别国对美国违反贸易规则行为进行抗诉的权利。中国和美国对于国际法截然不同的态度展现了中美关系中又一具有矛盾性的方面。在国内，美国远比中国更为尊重法治；但在国际上，美国对接受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的约束感到很不自在，而中国则逐渐乐于接受。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公约的谈判于1994年最终完成，[1] 中国在1996年批准加入了这一公约，而美国至今仍未批准加入。

亚洲国家现在是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它们希望看到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的强化而不是弱化。

四、实用主义的推进举措

虽然亚洲国家将在应对全球治理改革时运用上述那些原则，但他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将是实用主义的。它们不会被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所束缚。邓小平的几段名言最能够体现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他曾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还说，最好的过河方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行事要小心谨慎，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亚洲国家将在应对全球治理改革时运用上述那些原则，但他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将是实用主义的。它们不会被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所束缚。

1 该公约于1982年12月在牙买加开放签字。1990—1994年，联合国召开非正式协商会议，以期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得到普遍参加。非正式协商会议终于在1994年7月完成了修改公约第十一部分的文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执行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该公约后于当年11月16日生效。——译者

考虑到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亚洲国家不会要求对全球秩序进行激进改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亚洲国家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

首先，我们可以将当前亚洲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态度与数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态度做一对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所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组织都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它们相信，由西方掌控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对于穷国来说，是不正义、不公平并具有剥削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受到了著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影响。普雷维什认为，只有国际经济旧秩序被推翻，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进步。

与之相反，亚洲国家并不想推翻这种经济旧秩序，即便它仍被西方所掌控。亚洲国家承认，这种经济旧秩序是不公平、不完美的，但亚洲国家准备继续在这一秩序内行事，同时逐渐地去改善它。因此，它们愿意接受现有的机制，如联合国、WTO、IMF 和世界银行。更重要的是，在二十国集团成立并最终取代八国集团之前，亚洲很多大国愿意与八国集团共事，尽管它们对八国集团并不感到满意。比如，2007年，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同意出席在德国北部小镇海利根达姆举行的第33届八国集团峰会。

其次，证明亚洲国家实用主义精神的第二个方面是，将亚洲和欧洲促进地区合作的方式做一对比。在推动地区合作方面，欧洲总体上倾向于采取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方式。近年欧洲通过里斯本条约进程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努力便是一个好例子。欧洲的方式是，先坐下来谈出一些具体的、复杂的协定，然后这些协定要获得全面批准，当它们在法律上获得批准后，合作方能启动。如果碰到了什么法律障碍，比如一两个欧盟国家未能批准这些协定，整个合作进程就会被耽搁下来。简单说，欧洲人总是采取符合标准的正式且具法律效力的方式。

与之相反，亚洲的方式要灵活得多，不会去强调什么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的协定。经常是，一则简短的意向性宣言就足以推动地区合作。让我们以“东盟 +3”机制为例，这一机制涵盖拥有约5亿人口的十个东盟国家和拥有约15亿人口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更大和更有活力的经济体。有关“东盟 +3”的宗旨和程序并没有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予以阐明。1997年，十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吉隆坡举行峰会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被首次邀请与他们展开非正式对话。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迅猛发展，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比如，仅在首次“东盟 +3”会谈之后五年，东盟便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了自贸协定，而后又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别于韩国和日本签署自贸协定。目前，已有更多的自贸协定生效，这13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已显著增长。在五年时间里，东盟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就实现了翻番，从2004年的464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902亿美元。东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增长了22.1%，从2007年的1731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2114亿美元。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则增长了逾十倍，从1995年

的20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2230亿美元。

"东盟+3"这个机制的名称可以表明亚洲国家之间合作的非正式程度，但更奇妙的是"东盟-1"或"东盟-2"机制。在欧洲，如果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两个国家未能批准里斯本条约，整个里斯本条约进程就基本上"脱轨"了。结果是，欧盟不得不重启整个条约的谈判，并且让条约再次进入正式的批准进程。相反，当东盟想要提出一项未能获得所有成员国赞同的合作项目时，东盟国家就会实用主义地同意采取"东盟-1"或"东盟-2"方式。比如，2007年，韩国与东盟签署的自贸协定便"减去"了泰国。这样一来，那些不能支持或参与地区合作项目的一两个国家就不会拖所有人的后腿。这绝对是一种实用主义。

"东盟+3"这个机制的名称可以表明亚洲国家之间合作的非正式程度，但更奇妙的是"东盟-1"或"东盟-2"机制。当东盟想要提出一项未能获得所有成员国赞同的合作项目时，东盟国家就会实用主义地同意采取"东盟-1"或"东盟-2"方式。

最后，我们看看亚洲国家超越双边政治分歧从而聚焦更大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这是证明亚洲国家实用主义方式的第三个方面。比如，近年来，因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以及印度接纳达赖喇嘛，中印双边政治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但是，即便存在这些紧张，中国和印度仍可以在它们拥有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很好的合作。

比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西方国家想"结伙"压制中国，中国则寻求印度的支持。亚洲知名新闻人士钱安达（Nayan Chanda）很好地描述了此事，"温家宝先生在次日上午便与辛格总理会面，并特别强调西方国家'结伙'压制中国的动作。据说温总理指出，只有中国和印度站在一起，它们才能防止西方国家草率地通过协议。他将辛格视为兄长，并请印度支持中国"。

这则有关中印进行实用主义合作的小故事很好地表明了亚洲具有在必要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继而展开合作的能力。从亚洲对待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式中，美国和欧洲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西方能够仿效亚洲的这些做法，整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太平。这就是为什么对西方人来说，研究和理解亚洲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包括发展全球治理的新体制等不断增加的挑战）的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亚洲具有在必要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继而展开合作的能力。从亚洲对待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式中，美国和欧洲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西方能够仿效亚洲的这些做法，整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太平。

（赵明昊　译；归永涛　校）